

香港與內地融合對香港社會發展的影響

黃健偉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研究主任

本文旨在探討內地與香港融合對香港社會發展的影響，並試圖提出融合對香港社會造成的社會（族群）排斥，有可能是一國兩制下階級因素所造成的社會發展問題，使香港社會可以在融合過程中盡享內地經濟高速發展的益處而一直毋須處理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代價。如何建立跨地域政策機制，在融合經濟環境下進行資源再分配，是亟待探討的政策課題。

關鍵詞：社會發展、跨境融合、階級、族群、分配

The Impacts of Integ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on Hong Kong's Social Development

Anthony WONG

Chief Research Officer,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integr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on Hong Kong'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a class-based argument against the prevailing ethnicity-based argument to explain the proble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rising from integration. It argues that a certain class across the boundary has benefited greatly from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while leaving all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unattended. This paper raises a policy question of how to establish a cross-boundary re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deal with this new transboundary class issue.

Keywords: social development;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class; ethnicity; redistribution

從 1980 年代開始，香港的某些階層一直享受發展的「免費午餐」，盡享與內地經濟融合帶來的龐大和即時的利益，卻因為在一國兩制的政策框架下，他們毋須理會融合帶來的一些香港社會發展矛盾。長期觀察及研究香港發展現象的著名社會

學者 Alan Smart 形容這種狀況為「融合與分隔的合併」(combination of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並指出這種狀況造成香港社會發展的複雜狀況 (Smart, 2003)。本文旨在探討內地與香港融合對香港社會發展的影響，並試圖提出融合對香港社會

通訊作者：黃健偉，香港灣仔軒尼詩道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901B 室。電郵：anthony.wong@hkcss.org.hk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articl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Anthony WONG, Room 901B, Duke of Windsor Social Service Building, 1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email: anthony.wong@hkcss.org.hk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造成的社會（族群）排斥，或許是一國兩制下階級因素所造成的社會發展矛盾¹。隨著融合深化，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代價(externalities)一直未有處理，深層的問題一下子浮現，原來的階級矛盾卻被地域或族群矛盾掩蓋，但社會上既得利益一群不但沒有反省多年來融合經濟下他們及內地資本家和富裕階層享受著社會發展的免費午餐，還把這種新的跨地域階級矛盾(transboundary class contradiction)以族群矛盾的形式出現。如何建立跨地域政策機制，在融合經濟環境下進行資源再分配，是亟待探討的政策課題。

一、經濟融合帶來的實質好處

純粹從經濟的量方面而言，香港與內地融合帶來的經濟實質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自從工業北移，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完全依賴服務業，並且一直以四大產業維持其經濟增長。融合對四大支柱產業的影響十分明顯。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四大支柱產業（包括貿易及物流、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金融及旅遊）於2010年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58%，增加價值接近10,000億元（港幣，下同）；相對於

10年前的48%，增加了10個百分點。其中尤以後兩者增長強勁（見表一）。旅遊業明顯受惠於2003年中央政府容許內地部份省市居民以個人遊方式到港澳旅遊之政策，其中「入境旅遊」方面佔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由2000年的1.7%增加至2010年的3.5%，比例增加超過一倍。金融業方面，內地來港集資活動頻繁，使「其他金融服務」類別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亦增加接近八成。按政府統計處的分析，入境旅遊的增加價值，從2005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增長高達12.5%；專業服務亦在迎頭趕上當中，同期每年平均增長10.3%；金融業亦以超過每年平均8%的速度增長。相反，貿易及物流雖然佔本地生產總值的份額最大，但其增加價值近年的增長速度開始減慢（政府統計處，2012）。

經濟融合為香港及內地部份企業及個人創造財富，但在一國兩制之下，他們的經濟活動引發的各種社會、文化問題，他們卻毋須負上直接責任。從早年的「包二奶」問題、到後來的跨境老夫少妻婚姻導致的家庭問題，到後期的跨境分隔家庭或假單親問題、跨境學童問題（So, 2003）。到再近期奶粉、住屋、單非雙非孕婦來港分娩的問題，以至近日的雙非兒童學位分配問題，兩地融合涉及到更廣的層面及更深入民生的環節，凡此種種，多年來積極倡議融合、並從中獲利不少的持份者（包括政府）都把它們擱在一旁，當中不少還積極反對政府以任何社會政策去處理這些問題，嚴重影響香港的整體社會發展。

1. 內地與香港兩地的居民，並不完全可以說是兩個「族群」，但香港現在的這種跨地域、文化處境比較獨特，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之間的關係，未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去描述，本文只能借「族群」一詞來形容，讀者須注意此概念的應用，有其缺點及局限性。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表一：香港經濟四個主要行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金融服務	11.9	11.3	11.5	12.3	12.2	12.7	15.7	19.3	16.0	15.2	15.4
銀行	8.3	8.1	8.2	8.4	8.0	7.9	9.5	11.5	10.2	9.7	9.6
保險	1.1	1.2	1.3	1.5	1.4	1.3	1.4	1.5	1.4	1.4	1.5
其他金融服務	2.4	2.0	2.0	2.4	2.8	3.4	4.9	6.3	4.4	4.1	4.3
旅遊	2.4	2.3	2.9	2.4	3.0	3.3	3.3	3.4	2.8	3.3	4.4
入境旅遊	1.7	1.6	2.0	1.7	2.2	2.4	2.5	2.6	2.3	2.6	3.5
外訪旅遊	0.8	0.8	0.8	0.7	0.8	0.9	0.8	0.8	0.5	0.7	0.9
貿易及物流	23.8	24.2	25.0	26.3	27.6	28.6	27.1	25.6	25.7	24.1	25.5
貿易	19.4	20.0	20.6	21.5	22.3	23.4	22.1	21.0	21.8	20.5	20.7
物流	4.4	4.3	4.4	4.8	5.3	5.2	5.0	4.6	3.9	3.5	4.8
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10.8	11.0	10.9	10.9	11.1	11.1	11.0	11.6	12.5	13.1	12.8
專業服務	3.3	3.3	3.3	3.4	3.6	3.4	3.5	3.6	3.7	4.2	4.5
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	7.4	7.7	7.6	7.5	7.5	7.7	7.5	7.9	8.7	8.9	8.3
四個主要行業	48.9	48.8	50.3	51.9	53.9	55.6	57.1	59.8	57.0	55.6	58.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2）

二、經濟發展模式滯後帶來的深層次矛盾

融合帶來的經濟增長，對香港本地社會發展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即使是經濟方面的發展亦然。由董建華年代以至曾蔭權政府，一直都把產業轉型掛在口邊。董建華提出要建設科技園、中藥港等，曾蔭權提出六大產業發展，大都意識到香港經濟發展模式明顯與地區以至世界先進經濟體的狀況脫節。然而，董建華的各種「港」未見有具體落實，曾蔭權的六大產業仍然是口號（從上述數字看到），香港經濟增長的結構不但沒有改變，傳統四大

產業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比例更節節上升。產業結構及增長模式未能轉型，整體社會民生亦被逼持續依賴既有的經濟產業結構，從堅尼系數的數據，已顯示這種經濟發展模式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關係²。

新的產業未能發展，與融合因素息息相關。四大產業的比重不斷增大，相信

2. 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的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年堅尼系數（稅前、稅後及分配後），都不斷在擴大。稅前的堅尼系數，直接反映在政府介入前經濟分配的狀況，數據為：2001年為0.525、2006年為0.533、2011年為0.535。見政府統計處（2012b）。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是一種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 的力量 (Mahoney, 2000)。簡單而言，由於內地市場的因素，依賴四大優勢產業的經濟誘因強大，面對它們製造的龐大、穩定、及即時利潤和商機，產業發展的成本結構對這些傳統產業更有利，對成本高、風險高、回報遲且不確定的新產業發展相對更為不利，在政府沒有積極的發展政策情況下，香港產業結構及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改變。

由於成本結構向四大產業傾斜，知識型經濟重視的創意產業、科技產業滯後。香港的手機、電腦使用率全球數一數二³，但對高增值科技發展、研發，及製造等相對忽視，反觀區內其他地方如南韓、台灣、新加坡等，均已有長足發展，特別是南韓，其高科技產品研發和製造在短短 20 年間，一躍而成為世界頂尖，部份品牌甚至能與美國高科技企業看齊（謝中琮，2002）。在香港，政府投入在創新科技產業方面或許不少，但發展思維仍未脫離以往發展支柱產業時模式，過於個體化，參與的研發單位或企業要單打獨鬥，獨力面對全球的挑戰，承受各種不穩定的因素及風險。

在知識型經濟的今天，當全球都積極開拓機會以知識創造作為經濟增長的模式，香港的經濟發展，卻因為融合的因素

仍然停留在知識運用的層面，參與創造知識步伐緩慢，為未來社會發展埋下退步的因素。

在融合的過程中，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向，被內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及力量左右。在經濟方面，因為內地資金和市場龐大，以致香港經濟增長重量而不重質、看短而不看長、求穩而不求進，像在等候內地社會發展到同樣水平後，才能再重新起步，不但被動，甚至可能是一種依賴；忽略了在現時的融合經濟中，香港在政策和制度上有的優勢，正正就是內地與香港經濟融合所看重的。可惜，香港卻因為融合的短期龐大利益，拒絕大力投資發展其優勢，開拓新的產業和改變產業結構以配合社會發展。

三、經濟融合製造反社會發展及福利情緒

相對被動、甚至依賴性的經濟結構造成貧富矛盾日漸加深，融合經濟活動亦造成許多其他各種的社會問題；在急速發展的社會中，相關的社會政策及制度理應與時並進，可惜，在融合的大環境下，因為要防止內地人或新來港人士使用福利及服務，一些過時的觀念和制度未能適度發展，一些可讓香港本地居民受惠的政策制度亦受影響，造成整體社會政策及制度優勢無法進一步加強及鞏固。部份既得利益者，更過猶不及，製造反社會發展及福利情緒，使所有進步的、與時並進的、補足

3. 可參考聯合國國際電訊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的數據。<http://www.itu.int/ITU-D/ict/>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或支援經濟發展的社會政策觀念和制度無法發展起來。

在補救性的社會政策方面，我們拒絕發展，以惠及基層有需要的市民。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不斷收緊社會福利及服務的申請資格，限制新來港人士或雙程証人士使用服務。新來港人士是否應該即時獲得社會福利服務，社會上有很多爭論（雖然，這些人士其實是融合經濟下的產物，香港社會對他們難言沒有任何責任），但這些對他們的限制，不單直接影響他們，還製造了一些影響土生土長人士的效果，影響香港整體社會政策及制度的健康發展，把資格審查(means-tested)為本的社會政策理念變得更為合理化，讓全民要意識到社會福利只可以給極有需要的人，強化某一種缺乏尊嚴的工作道德(work ethnics)，迫基層工人接受各種苛刻的工作條件及待遇。

以社會保障政策為例，作為本港唯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一直是支援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唯一出路。對新來港人士而言，由於他們的教育水平及工作經驗不被認可，他們往往在來港後成為低收入戶，需要綜援金協助其適應香港生活水準，慢慢過渡至自食其力。可是，特區政府在2003年人口政策報告書中，不但沒有為投資本港人口作更進步的改革，還建議收緊申請資格。以往新來港人士來港定居一年，便合資格申請綜援，但社會福利署於2004年1月1日起，訂立新的居港規定，禁止新來港定居

少於7年人士申請綜援（政府新聞處，2003），自始以後，在資產審查後合資格的新來港人士，若未居港足夠7年，便沒有資格申請綜援，定居香港少於7年的受助個案亦大幅減少（見表二）。

針對新來港人士收緊綜援申請資格，對其他有需要的家庭申請綜援亦有影響。正如上述所言，每次社會對收緊綜援申請資格的討論，都不會只限於某社群，社會上反對福利的人士及團體，對所謂不值得給予援助者(undeserving)，總會乘機一併打擊，即使這些攻擊未必影響其他申請綜援人士，但社會對提出更進步、更切合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實力的社會政策及制度（如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便更加困難。

更重要的是，收緊對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資格，難免影響基層工人的收入。新來港人士若因此未能得到任何實質經濟援助，在面對最基本生活的困難時，只好接受僱傭條件更差的工作。從表三及表四可見，新來港人士無論在薪酬及職位方面，均遠低於本地在職人士。在這種情況下，低收入人士（無論是新來港人士還是土生土長的）的收入都難以得到改善，加深了兩者的排斥情緒。

四、經濟融合帶來的社會融合挑戰

在發展性的政策方面，香港的服務、福利，以至產品量在保持適度的增長之餘，亦開始產業化，為外地顧客提供服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表二：新來港定居少於 7 年的綜援受助人數目

年	綜援受助人		新來港定居 少於 7 年的受助人 佔總受助人數比例 (%)
	新來港定居 少於 7 年的受助人數 (年底數字)	總受助人數 (年底數字)	
2002	69,345	466,868	14.85
2003	71,927	522,456	13.77
2004	72,816	542,017	13.43
2005	60,178	539,963	11.14
2006	47,732	521,611	9.15
2007	35,677	496,922	7.18
2008	28,316	475,625	5.95
2009	24,925	482,001	5.17
2010	19,127	466,006	4.10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10）；社會福利署網頁，網址：<http://www.swd.gov.hk/>

表三：1996、2001 及 2006 年按職業劃分的 15 歲及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及全港人口百分比分布 (%)

職業分類	1996		2001		2006	
	內地來 港定居 未足 7 年人士	全港 人口	內地來 港定居 未足 7 年人士	全港 人口	內地來 港定居 未足 7 年人士	全港 人口
經理及行政人員	8.5	12.1	3.0	10.7	2.0	10.8
專業人員	1.8	5.0	0.9	5.5	0.9	6.1
輔助專業人員	5.2	12.1	4.1	15.3	4.2	16.1
文員	13.5	16.8	10.9	16.3	11.3	16.9
服務工作及商業銷售人員	22.0	13.8	30.7	15.0	37.7	16.4
工藝及有關人員	14.7	12.3	11.0	9.9	9.2	8.5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8.3	8.5	4.1	7.3	3.0	6.2
非技術工人	25.3	18.6	34.9	19.5	31.7	18.8
漁農業熟練工人及不能分類的職業	0.7	0.8	0.3	0.3	0.1	0.3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6）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表四：1996、2001 及 2006 年按每月主要職業收入劃分的 15 歲及以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及全港人口百分比分布及每月中位收入

每月主要職業收入（港元）	1996		2001		2006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	全港人口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	全港人口	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	全港人口
<2,000	2.3	1.9	2.4	1.8	3.2	2.0
2,000 - 3,999	10.2	8.0	11.3	8.6	11.5	9.7
4,000 - 5,999	28.4	10.5	29.6	8.3	28.9	9.8
6,000 - 7,999	24.3	15.9	27.9	12.3	26.9	13.8
8,000 - 9,999	13.8	15.8	12.3	12.2	12.0	12.5
10,000 - 14,999	10.9	22.2	10.8	23.0	9.4	20.7
15,000 - 19,999	3.9	9.8	2.4	11.5	3.6	10.6
20,000 - 29,999	3.3	8.0	1.6	11.2	2.4	10.1
≥ 30,000	2.9	7.9	1.7	11.1	2.1	10.8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金額（港元）						
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	6,500	9,500	6,000	10,000	6,000	10,000

註：這些數字不包括無酬家庭從業員。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6）

務。由於內地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造就了一大批經濟實力強大的民眾，他們有能力跨境來香港購買／獲取這些有信譽、有質素的制度、服務及產品，以致香港人認為這些發展的得益者並非他們，而是內地人。昔日，內地的經濟發展靠香港的資金發展起來，但隨著內地經濟發展，舊日內地來港打工的「阿燦」消失了，換上了一群「港燦」，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香港人似乎一下子失去競爭能力，社會上出現了各種捍衛本土利益的聲音和行動。

a. 醫療服務

最受公眾關注的一項，相信是內地婦女來港分娩的收費。2006 年，醫管局把外地來港非合資格孕婦分娩套餐的收費，大幅調高至 39,000 至 48,000 元，醫管局的理據，是要以高昂的收費遏抑內地婦女來港分娩。限制父母雙方均非香港居民的人士來港產子，社會上大多都甚表認同，但融合經濟產生了本地居民與內地居民組織的跨境家庭，這些孕婦來港產子，香港難言沒有責任提供服務。然而，一刀切對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所有內地孕婦收費後，未能把問題解決之餘，更製造了新問題；由於價錢相若，內地孕婦轉往私家醫院安排生育，造成本地私家醫院的床位緊張，直接影響本地孕婦在私家醫院分娩的機會。

b. 高等教育

隨著中國經濟和政治實力的增加，全球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的發展上；香港的大學亦不甘後人，藉著香港與內地的融合，開拓新的學術網絡。在這種環境下，近年香港高等教育不斷擴展，內地學生明顯得益。從表五可見，研究院修課課程，以香港學生為主，入讀的內地學生寥寥可數，這些課程部份學費十分高昂，但學生要自掏腰包支付費用，才可以享受服務。相反，研究院的研究課程，則內地學生入讀人數於 2010/11 學年，已超過香港本

地學生一倍以上，這些課程，絕大部份為學生提供獎學金 (studentship)。兩地融合為內地生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讓他們可以更具競爭力，取得這些入學機會和資助。

c. 住屋

近年，香港物業市場熾熱，樓價不斷上升；近期更超越 1997 年的水平。不少香港市民認為內地居民來港置業，把本地樓價不斷推向新高。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回答立法會議員的發言指出，土地註冊處只備存有關經該處註冊的香港物業交易資料，但並沒有有關物業交易有多少買家為境外人士或內地人士分類或買家置業的目的等資料（立法會，2011）。話雖如此，內地居民刺激香港物業需求仍然是有跡可尋。根據香港一些大型物業代理的資料，

表五：2009/10 至 2011/12 學年按修課程度及原居地劃分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學生人數

修課 程度	2009/10 學年				2010/11 學年				2011/12 學年			
	本地 學生	中國 內地	亞洲 其他 地區	其他 地區	本地 學生	中國 內地	亞洲 其他 地區	其他 地區	本地 學生	中國 內地	亞洲 其他 地區	其他 地區
副學位	7,003	2	2	2	6,918	2	1	2	8,274	-	1	1
學士學位	51,419	4,562	436	193	51,967	4,638	721	57,565	52,499	4,582	1,057	274
研究院修課	3,558	35	12	6	3,513	43	12	10	3,599	55	17	15
研究院研究	2,239	3,830	146	107	2,056	4,041	216	6,462	1,805	4,298	280	188
總計	64,219	8,429	596	308	64,514	8,724	950	400	66,177	8,935	1,355	478

資料來源：立法會（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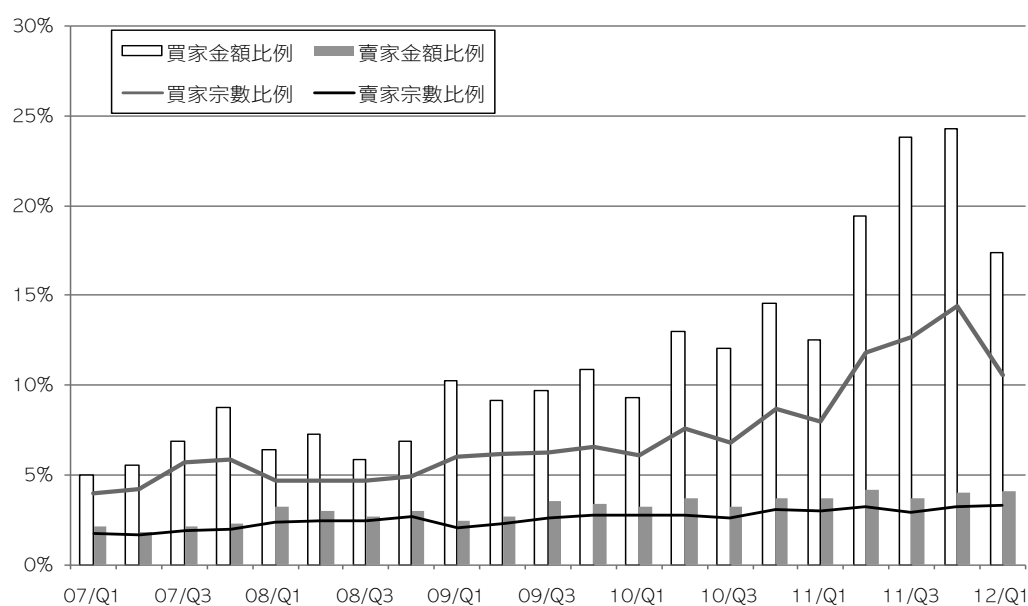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內地居民在香港物業市場的參與明顯地不斷增加。中原地产的資料顯示，無論是買家的數量或其投入的金額，均顯示內地對香港物業的需求在香港總需求內佔一個重要的比例，而且一直上升。從圖一數據可見，高峰時內地買家佔整體買家人數約15%，而他們涉及的成交金額，更佔總成交金額近25%，有理由相信，他們在豪宅市場的參與尤為顯著。

同樣地，按美聯物業公布的研究數據，2011年香港整體住宅註冊金額的內地買家比例為19.2%，較2010年的10.8%急升8.4個百分點，創下有紀錄以來新高，而有關買家購入單位涉及金額估計高達600億元（明報，2012）。

事實上，現時本港物業代理推售新樓盤的策略，亦明顯有改變，很多新樓盤（特別是豪宅）在香港尚未容許公開發售

圖一：香港私人住宅內地個人買家與賣家按年統計 *



*2012Q1 截止於3月的臨時統計

- 註：
1. 私人住宅不包括公屋、居屋及夾屋
 2. 對已知買家及賣家資料的買賣登記進行統計
 3. 內地買家及賣家只限於個人，不包括公司
 4. 內地買家及賣家是以漢語拼音名字為準
 5. 買家數字包括一手及二手市場，賣家數字只包括二手市場

資料來源：中原地产市場統計部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時，便搶先在內地一些城市進行業內人稱為「路演」的銷售活動。內地居民投資及投機香港物業市場，並逐漸成為支撐樓市的重要支柱，對有物業的人士而言有利，但對基層市民及一些年輕上車人士卻造成十分沉重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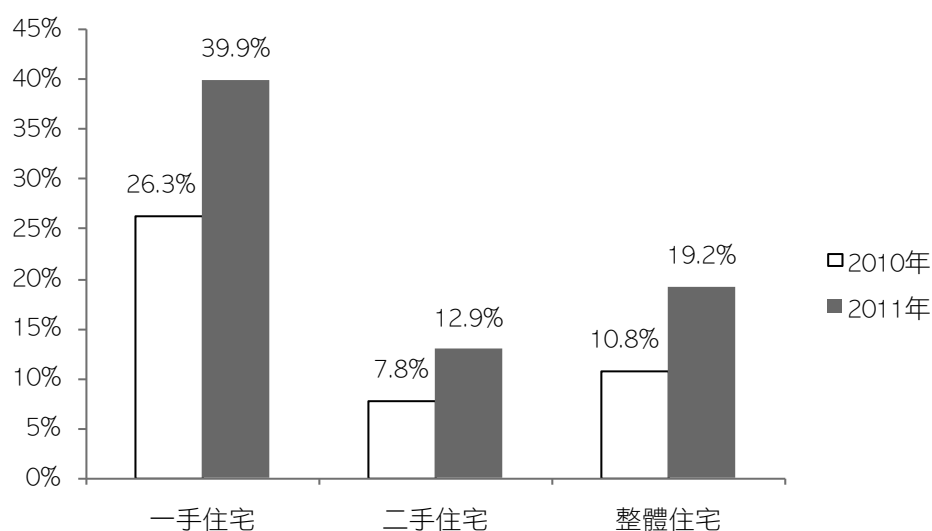
d. 奶粉問題

香港嬰兒配方奶粉供應情況於近年來一直備受關注，特別是當內地奶粉供應接二連三發時間題時，香港嬰兒配方奶粉供應短缺及價格上調的情況亦加劇，「奶粉荒」及奶粉搶購或炒賣問題湧現。在高峰期，有藥房將疑是「水貨」的外國奶粉價錢推高一倍出售（明報，2008）。內地

消費者對香港嬰兒配方奶粉的需求劇增，此情況導致香港嬰兒配方奶粉的供應短缺一至兩成（立法會，2010）。

2011年，民主黨婦女黨團訪問了185位家中有2歲或以下嬰幼子女的人士（主要是婦女），調查他們對於現時奶粉價格及供應的意見。調查結果發現，約有50%的受訪者表示現時購買奶粉遇到困難，63%認為奶粉缺貨對她們造成影響，77%覺得現時奶粉的價格並不合理，對基層及中產婦女造成壓力（民主黨，2011）。消費者委員會於2011年3月出版的《選擇》中披露，該會調查市面上33款主要牌子的嬰幼兒奶粉，發現其中24款的平均售價升幅達4%至12%（按

圖二：香港私人住宅內地買家所佔比例上升



資料來源：明報（2012）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2009年4月至2010年2月，及2010年至2011年同期的價格作比較），升幅高於同期的食品通脹率（3.6%）（消費者委員會，2011）。調查亦發現，部分受歡迎牌子奶粉的缺貨率甚高，最高達64%，政府亦相信非本地人士搶購是缺貨率高企的原因之一（食物及衛生局，2011）。

這種情況令香港家長甚為不滿。香港家長在親子網站集體留言，批評內地遊客及水貨客搶購，令香港初生嬰兒奶粉長期缺貨，希望政府開徵「奶粉離境稅」，以保障香港嬰孩有奶粉吃（明報，2011）。

從宏觀的社會發展角度看，香港的一些政策措施引發公眾想像新來港人士、準來港人士，以至兩地融合對本地造成負擔，然後順理成章地提出限制他們使用本地服務，卻同時限制了本地公共服務原本應有的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一些發展性的服務或制度的改善及擴展，在香港人眼裡看，卻都好像盡給內地人取用。以產科服務為例，過去一段時間，私家醫院的服務為了內地孕婦的增加而不斷擴充，但公營醫院的服務亦同樣因為內地孕婦衝急症室而每況愈下。表面上，問題是「本地人」和「非本地人」的對立，但同時，一種「認錢不認人」原則被確立：對私家醫院服務的需求不是所有內地人，而是一些有經濟能力的內地人（及本地人）；至於原本非本地孕婦不能使用的公立醫院服務，但只要她們能夠跑來香港，並能繳交

比本地人高幾十倍的費用，她們就可以使用，變相是「認錢不認人」，由於公營服務部份被內地孕婦使用，沒有經濟能力的本地孕婦的選擇才是最受影響。

五、融合對香港社會發展影響的真假命題：族群矛盾 vs. 階級矛盾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香港的福利、服務、高檔商品，以至日常生活用品都給內地人取用，在公共論述的層面，不斷強化香港與內地融合造成對香港的負擔（特別是福利的負擔），卻完全沒有看到，在融合的過程中，一方面香港的富裕階層享盡各種實質經濟利益，卻不用為其經濟活動帶來的社會代價（externalities）負更大的責任。部份還為了鞏固其利益，藉族群矛盾（內地與香港）倡議反社會發展的政策，表面上只反對新來港人士、準來港人士享受本土福利保障及服務，實際上亦影響了香港社會政策及制度按社會發展的階段進一步完善，使之脫離了客觀發展狀況、脫離市民對現實社會發展的期望。香港社會服務會（2012）的社會發展指數已表明，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經濟發展，在環球各種不穩定因素之下，仍然表現超卓，但社會民生、社群發展的表現卻不升反跌，市民明顯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最令人感到無奈的是，偏偏就是這些得益的階層，最不遺餘力地藉著排斥族群的論述，提出各種反社會發展的論調，不斷強化香港人對內地人的不滿情緒，加深族群之間的磨擦，轉移了社會對跨地域階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級利益分配的注意。

另一方面，內地的一些居民，亦因為其階級背景，在香港市場內得到各種其所需的服務及產品。明顯地，這不是由於內地缺乏那些服務及產品，而是由於他們認為，在香港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下，那些服務及產品的質素和信譽會獲得更大的保障，因此願意付出更多來香港換取。換言之，他們來港購買的不單是服務和產品，而是香港的制度所產生的價值（positive externalities）。香港的教育、醫療、福利、房屋，多年來為基層市民提供堅實的生活保障，是把一種人本的人文關懷化成制度，使香港的服務和產品質素得到良好的信譽。今天，這些制度成果為內地人民所嚮往；然而，香港部份人卻認為這種制度成本太昂貴，限制這些保障人民和社會健康發展的制度向前發展，就好像要把香港社會發展的進程停下來，待內地社會趕上來，才可以再出發。

六、結論及政策啟示

無論如何，觀乎在整個融合的過程中利益重新分配的結果，不禁令人質疑族群矛盾這個命題的準確性。相反，可能更令人信服的假設是：在全球化環境下地區融合經濟產生了新的跨地域階級矛盾，這種階級矛盾跨越地域族群，其經濟矛盾成份隱蔽在地域／族群差異後面。

當然，本文提出這種跨地域階級矛盾，只是一項假設，未有很多直接的証

據，筆者只期望引發更多討論及實証的研究。提出這種假設，亦並非否定兩地族群矛盾存在的可能性及真實性。相反，本文希望提出的觀點是，族群矛盾亦有其物質基礎。正如上文所述，在內地改革開放前及初期，港人憑藉較佳物質及制度基礎，發展出一種相對內地人的優越感，及至1990年代後期，內地經濟發展起來，港人的優越地位消失，又眼見內地人來港大量消費、使用服務等，再加上他們文化生活習慣與本地有差異，文化、階級因素互相影響，族群矛盾隨之滋長、發酵。

如果這個階級假設成立，那當前最大的政策問題，就是經濟融合後香港（及內地）在過程中得到的好處，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分配到社會上有需要的階層（無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新來港人士、還是跨境人士），以致消弭社會排斥。這是涉及一國兩制的核心問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如何建立一套再分配的政策及機制，把由兩地富裕階層主導的經濟活動造成的社會代價，由他們來承擔更多的責任。例如：香港的商人在內地從商造成的各種對內地和香港的社會代價，是否應有制度使他們也要負上更大責任？內地企業或個人來港投資、置業、購物等，他們的經濟活動產生了一些經濟利益，又是否要從這些利益入手，以支付一些社會發展需要的開支？

另一個相關的政策，就是人口政策。長期以來，香港政府在處理外地人口來港的政策，都是交白卷，最近公布的人口政

Not for Circulation
只供參考，請勿傳閱

策報告書，亦乏善足陳。政府沒有明確的人口政策引導內地和國外人口理性、有序地，按香港實際情況進入及融入本地生活，結果造成今天的各種族群利益的衝突。如何處理，非本文有限的空間能夠觸及，但肯定新一屆政府必須在有關政策方面下點功夫。

參考文獻

民主黨（2011）：《奶粉缺貨 婦女憂心：三八婦女節調查結果》，網址：<http://www.dphk.org/?p=8875>

立法會（2010）：〈立法會會議（會議議程）〉，2010年6月9日。

立法會（2011）：〈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11年6月29日。

立法會（2012）：〈會議過程正式紀錄〉，2010年3月18日。

明報（2008）：〈黃金周開始奶粉渴市 藥房炒貴一倍〉，2008年9月30日。

明報（2011）：〈港媽媽聯署倡奶粉離境稅〉，2011年1月28日。

明報（2012）：〈內地客去年600億買港樓 佔整體成交兩成幾近倍〉，2012年1月28日。

政府統計處（2006）：《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10）：《香港統計月刊》，2010年9月，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12a）：《香港統計月刊》，2012年2月，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12b）：《2011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收入分布》，香港：作者。

政府新聞處（2003）：〈行政會議通過領取綜援和公共福利金的七年居港規定〉，《新

聞公告》，2003年6月3日。

食物及衛生局（2011）：〈答覆立法會問題〉，2011年4月6日。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2）：〈香港社會發展指數2012發布會〉，3月7日，網址：<http://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node/205>

消費者委員會（2011）：〈24款奶粉加價超通脹〉，《選擇》，435期，頁19-25。

謝中琮（2002）：《台灣、日本、南韓產業科技競爭力之比較探討》，台灣：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Mahoney, J.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4), 507–548.

Smart, A. (2003). Sharp edges, fuzzy categories and transborder networks: Managing and housing new arrivals in Hong Kon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6(2), 218-233.

So, A. (2003). Cross-border families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5(4), 515-534.